

批判与超越:现代工程与主体形而上学

高海青¹, 姚宇臣²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2.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通过把现代工程置于现代形而上学的轨迹来理解和把握其本质,可以发现现代工程的本质比现代技术的本质更接近海德格尔所谓的“集置”。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要超越作为“集置”的现代工程,只能从审美维度入手,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都重视艺术这种解蔽方式,但在现代工程思维和工程方法论成为信仰的时代,艺术是被排斥在边缘的。通过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在两位思想家的理论中都有政治解蔽,但海德格尔没有明确将政治把握为一种解蔽方式,马尔库塞沿袭马克思主义,将政治这种解蔽方式明确化了。近年来芬伯格技术设计思想对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的推进,随着对现代工程之政治维度的再度重视,超越现代工程的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重新涌现了出来。

关键词:现代工程;主体形而上学;存在哲学;实践哲学;政治维度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1-0090-06

现代工程与主体形而上学这两种相距甚远的话题何以能出现在一种共同的语境中?对现代工程的反思就是现代形而上学吗?抑或,现代工程就是现代形而上学的表达?何以可能呢?目前国内对工程的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还处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轨道,而在轨道内反思轨道本身,这依然是一种现代主体哲学的理路,无法本真地沉思工程的本质。所以,从存有论出发,步入另一条轨道当中,将存在者整体作为筹划的唯一对象,将工程和现代形而上学纳入存在者整体之中,才能真正思考工程的本质,而这种筹划也才是真实的沉思。

一、从工程的概念谈起

18世纪,欧洲创造 Engineering 一词,最开始主

要指兵器制造、军事目的的各项劳作。随后 Engineering 的含义扩展到建筑屋宇、制造机器、架桥修路等。工程(Engineering)这个动名词衍生于动词 Engineer(建造、设计),其词根 Gen 的意思为生产、制造,因此,工程(Engineering)含有行动(Action)、做(Doing)的意味,以 Engineering 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即“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门类,就是工程哲学(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目前,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学界,主要关注的都是 Engineering 意义上的工程哲学。这种“工程哲学相对专业化,主要涉及是对工程知识和工程师伦理的理解。”^①

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Engin-

^① 这是芬伯格在与笔者讨论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的区别时给出的自己的观点。

收稿日期:2015-11-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5YJC720008)

作者简介:高海青(1983-),男,山东滨州人,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eering 对应“工程”,诸如,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矿业工程(Miningengineering)、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等。Project 也对应“工程”一词,比如,文化工程(Cultural projects)、希望工程(Hope project)、九年义务教育工程(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al projects)、三峡工程(Three gorges project)、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哈巴谷工程(Project Habakkuk)等。甚至 Program 有时也译为工程,比如,菜篮子工程(Vegetable basket program)、米袋子工程(Rice bag program)等。从中可以看出,中文“工程”的含义似乎比 Engineering 更为宽泛,这点似乎有所预示。

在此,先不讨论这种预示,先关注为何社会各项活动都高举“工程”大旗,言必称“某某工程”?原因是工程能够体现人类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吗?毋庸置疑,工程实施和工程思维能更好实现人的现实物质需要,解决人的就业,提高生产效率。确实有的工程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工程的实质。因为,工程实施和工程思维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如生活世界的非精神化和机器化,内在世界普遍增强的危机感和虚无感,现实世界的过度污染、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疾病传播和传统文化消失等等。

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一种相对正确的解答是,无论工程本身是否合理,任何事物一经纳入到工程的话语体系当中,立刻就具有一种不容批判和不许怀疑的特性,成为逻辑必然的意识形态,并终将成为社会现实。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即便是对由工程带来的危机的解决也还是集中采用工程的办法,比如,“灵魂工程师”“文化工程”“净化工程”“园林工程”“环境工程”等等。如果还有无法被工程化解的因素,就会被认为是工程的必然代价,进而被工程排除在外,从而边缘化。这就是学界常说的现代性的“集中”和“排除”逻辑。

当然,如果仅仅理解到这个层面,我们定然还停留于前批判的阶段。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没有经历西方近现代形而上学浸染、传统文化影响深刻的东方发展中国家何以对工程如此偏爱,竟使工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神话?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和追问“工程”一词为何对应几个英文语词极其相关。强调机械和设备的 Engineering 翻译为工程是无可厚非的,但为何有“规划、设计、打算”之义的 Project 和“程序、计划”之义的 Program 都被翻译为工程?工程何以能够取缔

“规划、计划、设计、打算”而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笔者发现,这种词义的僭越抹杀了工程本身的生成过程。这种词义关注的是对象化的结果,而对象化本身的历史过程被遗忘了,并且人的不在场状态也被遗忘了。

但是,对“工程”的强调符合我们当前的历史事实,强调技术化和物象化的工程更适合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需求。不过,我们的世界在强调工程这种倾向技术性和对象性的特征时,遗忘了工程本身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政治性。工程自身显现为身处历史之中却超乎历史之外、生产历史却又消解历史的社会现象,海德格尔有预见性地将其本质把握为“集置”。

二、工程是主体形而上学的完成

目前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等研究领域都强调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分界,强调三元论,强调各领域之间的转化,重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分析方式有其可取之处,能够为各学科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这条进路将工程局限于 Engineering 的层面,遮蔽了“工程”在当前社会的突出地位和本体论、认识论意义。按照李伯聪的理解,“我们可以简要地把科学活动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1],这种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学的、实证主义的定义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因为,按照这种人类学的、实证主义的定义方式,我们的思想仍然囿于主体哲学的筹划范围内,无法在存在者整体的视域内洞见生成和变化,无法从发现、发明和建造的演化中意识到“铁笼”、持存物和异化存在的踪迹,而这些后果是主体哲学和表象方式无法解释的,更是它们无法化解的。

人类学、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分析方法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哲学所批判的。实践哲学将科学、技术、工程都置于社会批判的语境当中,对它们的批判与对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观念论的批判是紧密关联的。而这种观念论是指,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以降的现代主体哲学。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集置”(Gestell),而“集置”这一语词命名的是“那种促逼着的要求,那种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

在此,需要澄清的是,为何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把握为“集置”,而在本文却放弃这种表述,将工程的本质把握为“集置”?事实上,将现代技术(Technology)的本质把握为“集置”,促逼着的解蔽方式,而将传统技艺(Techne)把握为自身展开意义上的解蔽方式。这种区分是有疑问的。比如,一把由现代机械生产的菜刀本身,一本由现代技术印刷的书籍本身,一盏由现代工艺生产的台灯本身,一把由现代工艺生产的小提琴本身,其本质是“集置”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这种分析的方式有曲解作为整体存在的现代技术的嫌疑,但这不也正是对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做粗略划分的后果吗?为何不将整体的现代技术把握为工程,而将工程的本质把握为“集置”,这不是更现实吗?确实,现代工程较之于现代技术,更能体现一种促逼着的要求,比起传统技艺,其组织化和控制化更直观和鲜明。因此,“集置”是现代工程的本质,而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工程的组成要素,作为持存物也是由工程订造的。

怎么能够更准确把握“集置”这一工程的本质?唯一的方法就是,返回现代性主体哲学,重新沉思“我思故我在”和“表象”的后果。笛卡尔所谓最严格的认识论的最为可靠的基础就是“我思故我在”,他自己将其比作阿基米德的“固定的靠得住的点”^[2],在他看来,这条真理是确实的,可靠的,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动摇,可以担当哲学的第一原理,在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中甚至将其抬高到可靠的新大陆的地位。而正是这条原理,昭示着现代主体哲学的登场,它暗含的谬误和带来的灾难在海德格尔的论断中清晰可见。

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将“我思”之中的“思想”经常把握为“知觉”,那么将“思想”把握为“表象”也贴近笛卡尔的意思^[3]。另外,笛卡尔经常将“我思”把握为“我思我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表象我表象”,而这种“我表象我表象”就必然同时暗含着被表象者。更为重要的是,笛卡尔的“表象”是一种“思量性的表象,是检验性的、验算性表象”。由此,我们可以说,被表象者总是在计算性的支配范围内得到保障的^[3]。这也正是笛卡尔将广延当成世界之规定的原因所在,因为广延必须是在量上恰可计算的,也就是说,是在质上无涉的。海德格尔更进一步,他认为,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信任必然带来的是,人也成为被表象者,存在状态成为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确信,而确信失去限制^[3]。

因此,“我思故我在”甚至“我造物故我在”都是

主体哲学的表达方程,其最终表现形式就是,人与自然成为被表象者,存在状态成为被表象状态。故而,人与自然就都成了“检验性、验算性表象”,人和自然都成为持存物,成为被要求等待加工和萃取的筹划对象,而它们的不可穿透的内在性、物质内容早已烟消云散。科学、技术和工程就是主体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鉴于工程已经将现代形而上学的控制和组织化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我们可将工程称为主体形而上学的完成。

如此看来,要对“集置”有所洞见,必须首先沉思现代形而上学。面对这种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我们的追问将我们置于一种不同于主体性哲学“我思故我在”或“我造物故我在”的境域,而是“我造物故我不在”的境域。这种境域根本不可能在主体哲学的视域内把握和理解。只有在追问的跳跃中,我们才能重新回到对存在者整体的把握上来。只有在本体之外没有任何本体,在主体或意识之外没有主体,在客体或物之外没有客体,我们才能理解主体形而上学何以将主体解构,何以将人异化为持存物的。换言之,我们需要从现代主体哲学所必然生成的关于表象与被表象者的分裂中走出来,以一种先于主客二分的同一性重塑工程。由此看来,存在哲学是一种可选择的工程现代化的道路,但需要以批判的、审慎的态度澄清其中的谜团。

三、存在哲学对工程的超越

人类在“集置”的运行方式下,就会认为解蔽的方式仅有现代工程,而会忽视其他的解蔽方式,如艺术、思、诗歌等。海德格尔认为,被忽视的解蔽方式才是看护人类文明的解蔽方式,才是真理的真正守护者。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这些解蔽方式才不会让人成为“持存物”。人类依靠阿波罗登月计划这项规模空前的工程,将人类的美梦送向了太空,但看到的却是光秃秃的死寂。貌似人类文明前进一大步,但数千年的人类存在意义却在工程的解蔽中变成镜中月、水中花般的空幻和虚无。工程将月球变成有待订造的“持存物”,也彻底遮蔽了蕴含人类存在之意义的审美情怀和人性关照。人类不得不在工程内部寻觅意义的处所。

但这种寻觅可能吗?在工程中,作为此在的自然和人成为持存物,任由工程对其订造。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此不无悲观的断言:“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连接而成稳定的组织,这是一个

正在加速的过程。人被转变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这就推进了普遍的齐一化。这架机器不需要优秀卓越的个人,只需要具有特定才能的、符合通常标准的人。”^[4]

工程为何能如此容易对人和物实施订造?为何要符合通常标准?对此类问题的追问又迫使我们陷入对工程的沉思。问题的回答不能再在现代工程的范围内得出答案,而必须在维持现代工程及派生现代工程的根基上寻找答案,即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作答。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主体形而上学是遗忘存在的历史,更确切说是对象性、对象化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在对象性的持存的东西,并非在它们自身特有的世界之中的向前站立,而是作为“集置”环节的持存物显现了出来。也就是说,物和人在面对工程时变得“无保护性”。在工程中,物与物之间的差别被拉平,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被拉平,人和物之间的差别也被拉平。

那么,人类能否从“集置”中获救。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纯粹的持存物,人类是能够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者,人类只要敢于追问存在的意义,就不可能和其他的物相同。在工程实践中的人类是带着可能追问存在之意义的一种“持存物”,完全有可能从工程的实际运行中脱离。因此,只要非本真本己的存在回归本真本己的存在,敢于面对存在本身,也就是从一味制造的意识的内在领域,回归此在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历史性的此在,人类就能获得救赎。

然而,如何回归历史性的此在?当然是通过本真的解蔽方式,通过艺术、思和诗,唯此能够“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征”。因为一切工程式的思维都“只是哲学运思衍生出来的和凝固化了了的形态”,也就是对象化的东西,而唯独“诗意的东西贯通一切艺术,贯通每一种对进入美之中的本质现身之物的解蔽。”在艺术或者说在一切本质的解蔽方式中,人才会体会到自己本身,体会到无蔽的真正呼声,才能够让存在者“在整体牵引的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居于自身之中,也即能够无限制地居于相互之中。”^[5]

这种对工程发问与艺术沉思的结合,为人类开辟了一条从工程建造到审美解放的道路。海德格尔希望由此能唤起人类最重要的解蔽方式,可是海德格尔也看到,在“集置”统治下的现代是很难的。但只要此在还拥有解蔽的能力,就必定蕴含自救的可能。

不过,海德格尔的“集置”容易给我们一种天命的印象,即,工程是一种“天命”。芬伯格经常犯这样的错误^[6]。事实上,这种天命是一种沿着某条轨道的必然命运,而跳出给定的轨道,走向其他的解蔽方式,就是自由。所以海德格尔的天命不是芬伯格经常说的宿命式的天命,而是一种一经意识到,就有可能走向其他解蔽之可能的天命。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另一种解蔽方式就是要同工程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保持对工程的泰然处之。

凭借海德格尔的洞见,我们应该努力“将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运用到历史理论的语境当中。”就是说,深度解读“解蔽性活动”,确定解蔽性活动是如何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工程世界,是如何敞开我们新颖的或不同的视角,以及围绕对真实和意义之何所是的不同理解又是如何重新安排我们的实践的。

这并非是简单易行的事情。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将艺术和诗歌把握为人类的解蔽活动,但众所周知,这些解蔽活动是一种强调个体性的解蔽活动,需要沉思,需要此在。面对比现代技术规模宏大、更为精细、难以抵御且高度组织化和控制化的工程,强调个体性的解蔽方式固然重要,但意义有多大?为何解蔽活动不包括以实践为取向的政治维度?或者是已经包含了政治解蔽,而我们未曾意识到?

事实上,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种对存在之意义的领会和把握,只能由诗人、哲学家完成。正是这种对存在之意义的领会,也隐含着一种由不同领会能力构建的等级关系,因此对存在之意义的把握必然有一种政治意蕴。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解蔽活动中包括政治解蔽,而完成这种政治解蔽活动的行动者除诗人、哲学家外,当然还有能领会存在的政治家。这种被认为与“存在”紧密相关的倾向于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英雄主义解蔽力量的偏见可能之前在海德格尔及其追随者的思想中就曾注意到^[6],比如,海德格尔按照对存在之意义的领会所区分的本真存在与常人。海德格尔的这种筹划方式决定了海德格尔的理论极限和实践境域有其深刻、重大的政治后果,这在海德格尔自身加入纳粹、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实践哲学对工程的超越

如果“集置”是一种促逼着的解蔽方式,而存在者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无蔽当中,那么放弃这种促逼

着的解蔽就是最可能的、最明智的选择。但放弃这种促逼着的解蔽,必然以另一种解蔽方式向无蔽之境开启。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必然存在多种可选择的现代工程发展模式。海德格尔将诗歌、艺术定为本真的解蔽方式,而对工程保持泰然处之的态度。实践哲学对海德格尔的政治解蔽做出发挥,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海德格尔的行动者转向了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产的具体存在,并要求工程向重新设计敞开。

海德格尔对现代工程的先验诊断就是,它的本质是“集置”,而马尔库塞对工程的历史性分析是,它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发达工业社会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社会”,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就是一个非本真的世界。毛瑞尔认为,“海德格尔后期和马尔库塞后期的著作都是围绕着相同的哲学—历史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相似的解决问题的结构”^[7]。我们可作如下解读,对海德格尔而言,解决工程问题就要通过艺术的解蔽方式,突破工程的历史命运;对马尔库塞而言,解决工程问题也要通过艺术,但不是突破“集置”,而是要重新设计工程。

具体而言,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层面上,用艺术解蔽补偿工程解蔽。马尔库塞后期同样转向美学,正如德雷福斯解释说,马尔库塞通过基本实践的革命性变革重新赋予存在一种新的解蔽方式。要摆脱一种经验形式,就必须通过另一种经验形式,要超越发达工业社会的工程思维,就必须依赖于审美的经验形式。尽管马尔库塞对美学的阐释有些海德格尔艺术自救的痕迹,但马尔库塞的美学阐释更多的是政治维度的实践学旨趣。也就是说,马尔库塞的美学不仅涉及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层面,而且涉及到社会现实的工程及对其实施的改造层面。

《单向度的人》最后部分暗含的艺术与社会工程的特定关系为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美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尔库塞的美学转向是其对社会工程分析的必然结果:感性是单向度的人的解放途径。马尔库塞把对社会工程的批判及为建立新的社会工程的革命等政治实践问题与感性解放的审美问题结合了起来。马尔库塞认为,经由艺术实现从哲学到政治学的发展是“不同于马克思预见到的一种哲学的具体化。”^[8]

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艺术“呼唤着、发展着所有促进生命的潜能、作为‘类存在’的人类意识”^[9],意识的主体应该是无产阶级。但在

马尔库塞的理论中,意识的主体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单向度社会的保守大众非但不再能肩负工业社会工程变革的重任,反而成为现有工业社会工程凝聚力的主力军。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艺术已经不再依附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意识。在此,马尔库塞从阶级意识转向生活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具体的个体存在,尤其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亚阶层。他们包括被遗弃者或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这些人“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10]。

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都重视艺术这种解蔽方式,但在现代工程思维和工程方法论成为信仰的时代,艺术是被排斥在边缘的。因此,艺术世界根本无力抗衡工程世界的殖民化。我们注意到,在两位思想家理论中都有政治解蔽,但海德格尔没有明确将政治把握为一种解蔽方式,马尔库塞沿袭马克思主义,将政治这种解蔽方式明确化了。虽然马尔库塞政治解蔽的行动者较海德格尔要更为现实和具体,但马尔库塞的行动者同样无力于社会工程的改造。

芬伯格不同于马尔库塞的感性之维,在这方面,他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他倾向于福柯式的对“技术代码”——当时的社会行动者语言与工程语言之间意义转化的一般规则——的重新编码,以实现对社会底层群体所固有的边缘化知识的整合。其目的是要找到一种“允许带有最少的统治色彩来玩这些权力游戏”的方法^[11]。所以,芬伯格的行为者是那些弱势群体、普通民众,他们生活在以工程技术为媒介的社会体制内,同时对这种体制强加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反抗。并且,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这确实是一支有生命力的现实的改造工程的力量。

现代性具有可选择性,科学、技术和工程更是概莫能外,这种洞见是芬伯格研究方法的必然结论。在其建构主义的理论视域内,技术的发展动力不是理性而是社会,工程更是如此,所以,工程应该像其他社会产物那样被民主化。普通民众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工程选择确立社会生活的准则。这些选择在普通民众的目的、目标、审美和用途等特定选择的范围内能够定义一新的工程世界。这种选择也能够定义在不同的选择中做出选择的主体:我们在通过工程制造世界中也制造我们自己。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实现具体存在意义上、而非主观意义上的“我造物故我在”。

五、结语

工程,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和普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参与工程设计的工程师,在设计工程和实施工程中,工程师应将更多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审美艺术等非技术因素纳入到工程设计当中。相比而言,更重要的是,工程必须决定于深受或将受工程影响的其他普通民众和使用者。只有决定于普通民众和使用者,才能确保各种利益在工程中的表达,才能更好的确保非技术因素的实施。

工程并非如同它被想象的那般符合合理性和逻辑,无论物象化的工程的技术术语如何难解,无论非物象化的工程如何意识形态化,工程也是扎根于生活世界的产物,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这些之前外在于强调技术性的工程的规定性,如今在自反的现代性意识当中显现自身,揭示自身。对工程的改造,已不只是工程师的任务,而是已成为一项普遍的人类使命。

参考文献:

[1] 李伯聪. 努力向工程哲学领域开拓[J]. 自然辩证法

研究,2002,18(7):36-39.

- [2]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3] 海德格尔. 尼采[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4] 雅斯贝尔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5] 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6] Feenberg A.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0.
- [7] Feenberg A. 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5.
- [8] Marcuse. Beyond one-dimensional man[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1.
- [9]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李小兵,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
- [10]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11] 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曹观法,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Criticism and transcending: modern engineering and subject metaphysics

GAO Hai-qing¹, YAO Yu-chen²

- (1.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Guangdong, China;
-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metaphysics, it's discovered that the essence of modern engineering is closer to "Ge-stell" called by Heidegger than the esse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Heidegger'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transcending modern engineering as "Ge-stell" can only start from aesthetic dimensionality. Both Heidegger and Marcus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rt, this kind of demasking mode, but in this period taking modern engineering thought and engineering method as belief, art is excluded to the edge. Through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it's discovered that political demasking existed in both of the two ideologists' theories.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at Heidegger didn't take politics as a kind of demasking mode while Marcuse specified it along Marxism. In recent years, Feenberg's technical design thought promoted Marcuse's technology criticism. As the political dimensionality of modern engineering is emphasized again,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ing modern engineering comes forth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Key words: modern engineering; subject metaphysic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prac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dimensionality